中国共产党在广东调查研究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百多年调查研究之南粤印记

■陈雷刚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开展了丰富调查研究实践，坚持从实际出发探索革命之路、建设之道和改革之策，破解发展难题，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政策方针。系统梳理党在广东100多年调查研究的实践历程，提炼总结其基本经验，可以为新时代调查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中国国情的工具，从广东实际出发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彭湃在广东掀起了农村调查的浪潮。1925年12月，在深入多地农村考察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设“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两门调查研究课程，组织学生到海丰等地考察。彭湃在海丰开展实地调查，结合自身从事农民运动的体会，形成了《海丰农民运动》这一考察报告。早期共产主义者深入广东社会实际调查，启发了工人和农民群体的阶级觉悟，形成了依靠他们广泛开展革命运动的理论自觉。土地革命时期，广东党组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较早地实践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土地革命”等，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局限性的探索。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理论和方法，摸索符合广东乃至全国实际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道。叶剑英主政广东时期，主持制定了华侨的土改政策、“巩固城市、依靠农村、面向海洋”的基本方针、“先大陆后海南，先平原后丘陵，先机器后人力”的天然橡胶发展方针等。1958年5月，周恩来在新会开展了七天六夜的调查研究，做到了轻车简从、深入基层、实事求是，堪称调查研究的典范。1961年初，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派出三个农村调查组分赴广东、浙江、湖南农村进行调查。3月15日至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农业六十条》，从体制和制度上，对农村人民公社作了较系统的规定，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以及农村摆脱三年困难局面发挥了一定作用。陶铸在主政广东期间坚持开展实地调查，为广东农村较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下了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在广东开展以点带面的调查研究，探索改革开放之策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多次到基层调查研究，总结推广以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为特征的“清远经验”，推动中央决策与广东实际紧密结合，有效推进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1992年，邓小平赴深圳、珠海等地开展调查研究，站在时代的高度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第二次浪潮。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高州、深圳、顺德、广州等地考察，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3年4月，胡锦涛深入广东湛江、深圳、东莞、广州四地调研，明确提出了具有科学发展内涵的思想。为了破解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广东省委于1998年围绕“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升级”等10个专题开展了为时四个月的调研；2008年又围绕“深化粤港澳合作”“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等12个专题开展了为时三个月的大调研，推动形成了“双转移”战略思想。

新时代以来，党围绕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高质量发展等在广东接续开展调查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四次到广东进行视察调研，为广东改革发展擘画蓝图。四次视察既有精准调研，又有别开生面的座谈会；既以问题为导向，又以指导实践为目的，是生动而深刻的调研示范。2018年，广东省委找准自身改革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提出“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后五年，围绕140多项专题开展了“深调研”，形成了一系列有益成果。2023年，省委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突出“制造业当家”、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等高质量发展工作部署。

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实践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百多年的调查研究，在回应时代主题和实践要求中不断解决现实问题，为广东革命、建设、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贡献。梳理总结百多年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经验——

（一）始终坚持深植群众、奉行人民至上是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工作取向和价值遵循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力量。调查研究首先要回答“为什么人”是这一基本工作的取向，从而明确调查研究的行动方向。党在广东100多年的调查研究无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集中群众智慧的特色。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为其群众路线理论的萌芽奠定了基础。彭湃坚持深入群众调查，为接近农民，他努力学习农民语言；为接近工人，他“拜工人为师，学会了拉人力车”。叶剑英在下达墟镇工作专题调研时，要求干部深入墟镇工人、店员、青年、学生、教师中了解问题。为群众纾困解难是调查研究价值立场的核心要义。陶铸通过调研，结束了珠江岸边渔民、船工常年“以船为家”的历史；了解到公共食堂的种种弊端后，他顺从民意，较早地在全国宣布解散广东公共食堂，始终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2018年10月23日，习近平深入清远连樟村视察时强调，产业扶贫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要引导和推动产业、项目落户贫困地区，及时为当地发展解决实际困难。集中人民群众智慧是调查研究价值立场的创新意蕴。陶铸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积极培育和推广“田间管理到户评比奖罚”的生产责任制，并将之誉为“洲心经验”。1980年7月，习仲勋深入粤北地区调研充分肯定了清远国有企业的“超计划利润提成办法”，“清远经验”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处理好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关系，进行了先行探路。

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历史表明：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调查研究的根本立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属性。通过调查研究，党坚持群众路线，紧密联系群众，为群众纾困解难，集中群众智慧，最终让人民达成愿景追求。

（二）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奉行实事求是是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基本要求和工作态度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否坚持解放思想、求真务实是真假调查研究的主要区别。党在广东100多年调查研究无不彰显着思想解放的特色和实事求是的要求。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运用大量的数据说明了当时海丰农民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状况，总结了农民参加革命的众多优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的重要著作”。叶剑英在接受中央委托广东制定华侨的土改政策的任务后，部署专项调研，提出要根据华侨的实际情况，制定保护华侨土改政策。习仲勋主政广东时特别强调：“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各级党委书记要多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

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历史表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是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取向的方法论。坚持从实际出发，秉持中立的立场去访谈、询问、收集数据、研究资料，最终在尽可能接近事物本质的基础上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

（三）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回应实践要求是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基本范式和根本动力

坚持问题导向、回应实践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矛盾观、发展观和实践观融为一体，赋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党在广东100多年的调查研究，充分展现了“扎根现实土壤、回应实践需求、回答时代课题”这一基本范式和根本要求。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革命的始发起点。土地革命中，广东党组织一边了解社会情况、开展调查研究，一边从省域实际出发实践苏维埃式革命道路模式，对“怎样进行中国革命”这个问题进行了局限性探索。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两次到广东调研，深入了解广东改革发展推进情况，形成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等系列论断；江泽民、胡锦涛在广东扎实调研，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协调的发展观，深刻地回答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问题。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四次到广东视察，调研内容涵盖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党的建设、社会治理等，为广东改革发展谋篇布局，从广东一域出发，系统回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之问。坚持问题导向是100多年来广东党组织调查研究的基本范式。陶铸在培育和推广“洲心经验”前，一直苦苦思考什么样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才能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什么样的农村经营运行模式才符合广东实际？习仲勋主政广东时，主要围绕“探寻制约广东发展的问题”“酝酿启动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等开展调研。

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历史表明：坚持问题导向、回应实践要求是调研研究的根本动力，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关切和实践品格。坚持以实践要求为目标导向、牵引动能，推动调查研究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正视问题，最终朝真正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阔步前行。

（四）始终坚持完善制度、发扬领导示范是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根本保障和根本优势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研究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做好调查研究要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构筑深入基层、指导有力、措施精准的制度机制。100多年来，党在广东不断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制度，党的领袖人物在广东笃行调研、率先垂范，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起到了榜样示范作用。中共三大通过的《青年运动决议案》要求“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开始从事农民运动的宣传及调查”。叶剑英主政广东时，形成了“摸情况”（调查研究），后开“神仙会”（征求群众意见），最后再“定政策”的“三部曲”。1961年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将县级以上党委领导定期进行系统典型调查制度化。广东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提出“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的工作机制，推动调查研究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各级党委不断完善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实行的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成效显著，通过领导干部联系帮扶、靶向施策，推动污染治理、生态建设迈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注重调研成果的转化运用是调查研究发挥功效的关键之举。1998年十大专题调研为广东作出增创四大新优势、形成“三大发展战略”提供了依据；2008年12个专题调研直接推动“双转移”战略决策的产生。领袖人物的示范表率极大地推动了调查研究的发展。党的早期领导人毛泽东、彭湃、苏兆征，深入广东农民和工人中开展调研。1961年毛泽东亲自坐镇广东主持调查研究，认真听取基层群众意见，为全国走出困境找寻办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分别到广东接续开展调研，他们是调查研究的组织者、躬行者和号召者。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先后4次到广东躬身践行调查研究，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发挥了“头雁”领航作用。

党在广东百多年调查研究的历史表明：完善制度规范和发挥领导榜样示范作用是调查研究的根本保障，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通过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保障机制、联系点制度、成果转化运行机制，发挥领导榜样示范作用，最终推动调查研究服务大局，全党形成重视调研、践行调研的良好氛围。

（作者是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处长、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秘书长）

人工智能助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窦畅宇

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今年以来，ChatGPT、文心一言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相继“出圈”，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书写了全新的时代背景。智能知识生产、数字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促使人们关注人工智能究竟对人民精神生活领域产生了什么新效应？

人工智能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关联

人工智能赋能精神生活的实践本质是实现二者的融合发展，将智能技术优势转化为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新效能。这一过程，也必然建立在两者内在关联的基础之上。一方面，人工智能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精神文化生产的重要渠道，互联网与构建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具有强关联性，人民需要的精神生活内容基于媒介技术生产与传播，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也以信息形式呈现出来。如今，人工智能作为信息技术的最新形态，已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设施”。在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确证人民价值观念、坚定人民理想信念的各个环节，人工智能都发挥着重要助推作用。如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助于创作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精准的议程设置有助于引导人民建立共同理想信念，大数据技术有助于及时发现并破解个别网民行为不端引发的风险。另一方面，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要求，规范了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其以合伦理的方式，助力文化内容的生产与传播。因为智能技术具有工具理性的特质，如果缺乏价值理性的规训，人工智能应用难免出现价值偏差，从而引发信息秩序的混乱。在构建精神文明共同富裕的实践中，人工智能将通过自主学习，获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所内蕴的价值观念和文明要求，最终实现人工智能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践的技术赋能与双向互构。

人工智能助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新图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新兴力量，人工智能在实践中展现出巨大优势。

一是内容生产的智能化与精准化。优质文化内容是文化资源的核心要素。人工智能能够通过算法，学习与精确判断大数据隐含的舆情走势、心理意图等信息，并据此创作更具针对性、互动性的内容，“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为“人机协同”的写作与编辑提供智慧支持。

二是文化传播的全息化与生活化。移动设备的普及和信息技术发展，导致虚拟与现实、劳动与休闲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网络世界与日常生活的边界也逐渐消失。基于当前信息环境，算法推送技术将优质的精神文化资源“润物细无声”地融入个体日常生活，让人们在阅读和娱乐中，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

三是文化资源的共享化与个性化。智能技术的应用丰富了边疆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的文化服务供给，有助于人民共享文化资源，弥合数字鸿沟。智能技术亦可通过读取用户阅读信息的偏好，对用户进行个性化的信息推送，建构适配不同群体的价值观教育场景，有效屏蔽错误观念与有害信息的干扰。

预防智能条件下的“精神贫困”

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以及优质精神资源的共建与文化财富的共享。智能技术是精神财富增长的新动能，天然具有“创造”作用，但并不能自然实现“共享”功能。无约束地运用人工智能，容易造成“精神贫困”，不仅无益于共同富裕的实现，更有悖于人的全面发展。

一是追逐流量热点导致“价值贫困”。人工智能很容易解决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贫困问题，但却不能自动解决“价值的贫困”问题。写作机器人的生产能力固然远超人类，但除了我们需要的内容外，也会产出大量有娱乐无内涵、有信息无文化、有流量无价值的“三无产品”，没有价值观引导和表达的创作，看似是文化产能的飞跃，实则是文化产业的“虚假繁荣”。本质上还是以点击率、浏览量作为标准，追求热点和流量的资本逻辑的体现。不能否认，流量效应会提高关注度，但不承载明晰价值观的智能创作，可能会干扰主流话语的传播，并造成新的冗余。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驾驭人工智能这一新工具，有效维护文化信息生产与传播的良性秩序。

二是习惯技术依赖导致“精神空虚”。人工智能作为内容创作的新工具，优势在信息收集、模型架构与分析的高效率，但有些工作不一定是效率至上的，如科研、写作、艺术创作等，这些由人类来完成显然更合适。一方面，过度应用智能技术代替人的工作，人之主动思考与创造的能力可能会退化；另一方面，习惯于方便快捷的智能搜索，习惯于接受“信息投喂”，人之主动选择和鉴别能力可能会弱化。最终人们懒于思考、不思进取、思想匮乏，更有甚者沉迷娱乐八卦、没有理想、精神家园荒芜。可以说，一旦人们习惯了技术依赖，失去信息主体性和信息责任感，文化资源越充裕，其精神生活就越贫困。

三是“数智鸿沟”扩大导致两极分化。由于技能与知识的差异，不同群体接触与运用人工智能机会可能不均等，其享有的信息红利也无法平等，值得警惕的是在此过程中衍生的经济社会结构性不平等。如果掌握了高端技术与知识的少数人，拥有文化数据的所有权和分配权，而大部分人因技能不足，无法享有同等权利，就在事实上造成了新的数智鸿沟，进一步扩大了不同群体知识、技术甚至认知的分化。所以，尽管人工智能是目前最先进的生产力，但不附加先决条件使用它，就无法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要规避智能技术的负面效应，需要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合理规制文化数据资源的生产、分配、使用与消费，让全体人民在共建文化成果的过程中共享文化资源。

（作者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讲师）

注：本文是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课题（2022GZGJ104）的阶段性成果。

今日论衡 之世相评弹

杨丽萍孔雀舞中舞者造型引争议
拿着显微镜找“不雅”又是何必

□闻仃

近日，杨丽萍的孔雀舞表演再度惹来争议，有网友晒出一组舞台照片，在她最新编排的舞剧《孔雀》中，有一段男舞者造型尺度很大，全身只穿着一条肉色紧身打底裤，侧躺在女演员怀里的时候，不仔细看会以为是全身赤裸。这组舞蹈剧照在网络上引发争议，意见呈现两极化。

网络上关于文艺的争吵，其实最能体现“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的世间常态。有一部分人认为，跳舞没必要穿得这么赤裸，这样可能会误导青少年；另一部分人则痛斥他们，自己看不懂还要剥夺他人欣赏的权利，脑子脏看什么都是脏的；还有一部分人则因这种争吵的存在而无奈，感慨现在的社会越来越保守，艺术的美感和多样性被扼杀。

说来说去，还是那个艺术和色情究竟边界在何处的陈年老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全世界恐怕已经争论了几百年，不同的社会心态、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情境场合，都会有不同的意见，永远难有统一答案。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往往就是会引发人的情感激荡和多样解读。

回到杨丽萍这段舞蹈本身，争议的本质，并不是我们的思想到底应该保守还是开放的问题，而是在社交媒体时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欣赏舞台艺术。

比起在网上看了几张照片就开始评论的网友，现场看过这台舞剧的观众，对于是否“不雅”更有发言权。有观众盛赞，这段男舞者独舞是整部舞剧的高光，“身体控制力超强，表现力一流，痛苦绝望的感情，从肢体语言中发散出来。当时看现场的时候，观众没有一丝因造型大胆而发出的嘈杂声，都沉醉在剧情之中。”

杨丽萍的回应，无疑更加证明了这段舞蹈在全剧中的重要性，她表示，演员那时的造型是符合剧情的，“那段舞蹈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最难的，少了其他的装饰，需要演员用极致的身体、肢体语言来进行表演。”

也就是说，哪怕是那些特别不能接受“赤裸”的人，在演出的现场，也并不会如此近距离地聚焦于舞者的造型和特定的身体部位，而会更注目于肢体的表达，沉浸于剧情的氛围，也就不会产生色情的感觉，相反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舞蹈艺术的表现力和震撼性。这也是为什么，即便当下媒介如此发达，现场的演出依然让人们心向往之。因为有时候的确是“距离产生美”，如何让大家在从观众席到舞台的距离间，欣赏到最具美感的表演，是很多舞台表演艺术家毕生都要修炼的功课。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将需要隔着一段距离欣赏的舞蹈表演，去瞬间截图下来，放大、聚焦，就为了拿着显微镜去找出那点“不雅”来？我国的文艺演出都是需要经过监管部门审批的，能够全国巡演这么多场的舞剧，思想性和艺术性大多是经得起考验的。实在欣赏不来，可以不买票、不去看，不必非要在社交媒体上断章取义地斥责，正义凛然地扣帽子。就好像自己不喜欢吃一道菜，就非得把整张桌子掀了一样，显得很没有教养，也没有必要。

每次谈论这个话题，都会有网友发出老剧《编辑部的故事》里的一张截图来阐明观点，剧中葛优扮演的李冬宝在回复读者疑问时说：“裸体一旦成为艺术，便是最圣洁的，道德一旦沦为虚伪，便是最下流的，勇敢地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不要被世俗的流言蜚语所困扰。”对于当下的网络环境来说，恐怕要从切勿挖空心思地站在道德高地制造流言蜚语开始。

（作者是知名媒体评论员）

建设新型婚育文化 广东精准发力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首席评论

□李妹妍

在人口高质量发展大背景下，婚育文化再获审视。近期，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宣布今年将在河北省邯郸市、广东省广州市等20个地市开展第二批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试点项目，大力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新型婚育文化，“新”在何处？不妨先梳理一下近年来官方层面对“新型婚育文化”相关表述的变化：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原国家卫计委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十三五”期间深入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意见》明确指出，培育“婚育文明、性别平等；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活健康、家庭幸福”的新型婚育文化；到2018年，“适龄婚育”提法出现在官方宣传材料中，“晚婚晚育”口号逐渐淡出；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强调“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构建新型婚育文化”。不难看出，随着我国人口发展形势的变化，“新型婚育文化”的内涵外延也在不断发展演变，不仅“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开始被频繁提及，“破除高价彩礼”“共担育儿责任”等具有时代特征的倡议，也被纳入进来。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并首次提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从这个层面理解，建设新型婚育文化，积极营造婚育友好环境，正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为连续三年唯一一个出生人口超百万的第一生育大省，人口规模巨大是广东的基本省情和显著优势。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不管是出生率，还是年出生人口数，都是近些年的低点。可以说，面临着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的现实挑战，广东对建设新型婚育文化、提振生育意愿，有着分秒必争的紧迫感。6月7日，广东卫健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实施意见》，围绕提高生育水平、促进人口增长，出台了系列支持措施，也被外界解读为“第一生育大省开始‘催生’”。

客观地说，生育率一旦下降，往往较难逆转。广东出台支持生育政策，更多着眼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因此，建设新型婚育文化，广东既要保持政策耐心，又要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一方面，要完善社会评价方式，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引导年轻人充分认识适龄婚育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生儿育女不仅是个人的私事，也是关乎家庭可持续发展的大事，更是事关长远发展的国家大事。近年来，从婚检、生育保险、出生缺陷筛查到产检、产假等的“一条龙”政策优惠，从推进婚俗改革移风易俗到大力推进0-3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广东因应人口形势变化特点，不断完善托育、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方面的生育支持措施，为稳定出生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建设新型婚育文化，期待广东拿出更多务实有效的举措，促进人们的观念更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更加坚实的人口支撑。